

是产业资本、而同时“反中反俄”的则是跨国金融资本。

但在对付中国问题上，西方跨国金融资本则有联手产业资本共同对付北京之策略。美国犹太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于2019年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的一次演讲甚至直接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竞争称之为“世界未来前途之争”，他在2019年9月9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关心”。这是非常引人深思的。

过去，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使跨国金融资本看到在中国赢利的巨大历史机遇。但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实施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最终都会走向“民选体制”；而一个国家只要引进选举机制——除了少数例外，如俄罗斯——跨国金融资本都能通过一手资助政治家、一手控制媒体，来主导这个国家的选举走向和结果，进而成为这个国家的幕后主导者和真正统治者。

跨国金融资本认定，中国既然开始了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就一定会最终走向“民选体制”，中国就将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的囊中之物。而中国迈上这条道路之日，便将是世界“历史之终结”，跨国金融资本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阿塔利所描述的“世界政府”将呼之欲出……

然而跨国金融资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坚持走自己的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成功应对，感染和死亡人数非常低，充分展现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因而有可能成为世界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板。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进一步向“世界政府”提出了直接挑战！到底是由资本来建立统治全球的“世界政府”、还是由中国主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挑战具有历史性的震撼，因此中国便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的头号敌人。跨国金融资本反对中国的实质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意图推翻中国现政权和体制。中国是“敌人”，而不是“竞争对手”……

西方产业资本虽然也反对中国，但更多的是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只有在涉及霸权之争时，中国才会成为“敌人”。视中国为“竞争者”是因为工业竞争、视中国为“敌人”则是源于对霸权之争——这里的“敌人”，与其他所有有可能成为美国霸权竞争者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特朗普在一次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公开声称“欧盟是一个敌人”，而中国仅仅“在经济领域是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坏的”。

显然，从总体上而言，西方产业资本认识到，推翻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代价巨大（有可能是战争甚至是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争），而且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到了拜登时代，这一点大致继承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不久前公开表示，通过美国对华政策来改变中国体制“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

但中国却依然是美国维护霸权道路上的一个危险对手。于是，在中国问题上，跨国金融资本与西方产业资本找到了“共同语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缓和了与中国的贸易战，但却

继续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肆意挑衅中国。

这一“共同语言”的潜台词则是不同的：产业资本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目标是维持美国的领先地位，但并不寻求推翻中国的体制；而跨国金融资本则不惜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甚至热战，以求彻底推翻和消灭中国政治体制，消灭他们一统天下、建立世界政府最主要的障碍。

### 阻止战争的方法：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事实上，跨国金融资本也在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上寻求建立对付中国的“共同语言”的机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凭空捏造出“新疆种族灭绝”的历史大谎言，就是试图将中国与伊斯兰文明拖进对立和对抗之中。应该指出的是，伊斯兰世界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的低潮时期，整个伊斯兰文明都尚未真正能够在军事上对抗西方发达国家。但伊斯兰文明有一个杀手锏：进入西方内部，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与西方基督—犹太教文明进行一场“非对称决斗”。

西方“民选体制”国家是否会出现新的政治极端化倾向、新的反犹浪潮以及新的社会危机等，都与这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密切相关。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西方凭空捏造出来的、旨在挑拨中国与伊斯兰文明关系的所谓“新疆种族灭绝”基本未奏效，伊斯兰世界根本不相信这一谎言……相反，伊斯兰世界正在竭力